

# 文化语境中的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

石 坚 王 欣 张劲松

[摘要]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作为美国 30 年代至 50 年代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两大主导话语,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语境交换和协商的产物。它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其政治目的是稳固社会上层建构,减少社会摩擦,消除不安定情绪,因而两者的话语模式具有相似之处。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都从有机统一的宏观角度出发,主张各经济部门的有效协调,或研究文本内的各种冲突对立的相互关系,两种话语交织,生产出一种抽象意义上人的概念,既可以作为经济领域中静态的定量分析,也可以作为文化领域中审美的永恒的载体,因而都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的社会效应。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新批评;话语模式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9—0114—05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SC08B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坚(1952—),男,山东齐河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王欣(197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英美文学。四川成都 610064  
张劲松(1970—),男,四川乐山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高管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文化批评。四川成都 610074

文学理论不应该脱离文化语境存在。文化语境是一个矛盾的所在,既是一块生产历史也展示历史的领域,也是一块生产独立审美意识和主导意识的领域。因此文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话语,而是和其他社会话语相协商的结果,追踪话语产生,寻找相关话语历史化的过程,可以更好的描述话语的流通。1929—1933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业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了44.7%和28%,失业率达到25%,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罢工、示威等活动接连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然而,在此语境中产生的新批评话语和凯恩斯主义话语,却各自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成为主导话语,起到了提高经济绩效,稳定社会的效应。两种话语之间的形成和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话语模式的角度研究,可以看到两种社会话语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流通,并探讨其话语模式的相似性。

## 一、凯恩斯革命和新批评

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都是在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的流通社会话语,是和社会语境相

交流的产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他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著作的发表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或曰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极大冲击,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理论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都起到了指导作用,当时的美国罗斯福政府所采用的“新政纲领”,就是凯恩斯理论在政府政策上的体现。两者最初并没有关系,但由于相互需要的客观基础,凯恩斯主义和新政提出后不久就开始相互影响,“30年代后期,凯恩斯思想开始深入白宫班底,这种新经济学由于1937年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随之就发生衰退,而增加国防开支出现繁荣,获得了牢固的认同。”<sup>[1](P301)</sup>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政纲领”建议以需求管理为核心,整顿和重建金融银行体系,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兴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提高人们购买力等,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拯救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

经济领域的危机和混乱,直接影响了社会其他话语。1941年南方知识分子兰瑟姆(John C.

Ransom) 提出“新批评”的提法,以区别于传统的学院派研究,这在当时的学界,也不啻为一场“文学理论革命”。新批评将文本视为一个复杂意义结构,或者说是语言的有机整体。他们将文学批评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运用细读等方法,研究文本中间的反讽、悖论、张力、歧义等结构性特征。这种方法富有教学操作性,起到了稳定大学教育的效果。同时,新批评视文学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意象、语言、对比、象征等都由主题统一控制,这种话语模式类同于凯恩斯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主张以政府作为中心建立一个有机的社会,以避免各政府部门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经济恶化。可以看出,新批评具有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相同的话语模式,作为稳定社会的社会能量,成为话语流通中的通货。

研究两种话语模式的相似性和社会作用,要在特定话语语境中,观察它们如何互相协商和互相交流。“谈判的一方是一个作者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currency)。”<sup>[2](P.6)</sup>新批评学术话语的传播是同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协商的结果。兰瑟姆等人是从重农主义转变为新批评的。1930年,兰瑟姆等曾以“十二个南方人”的名义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我要采取我的立场》掀起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重农主义运动。他们回望南方的过去,从南方的家庭、宗教、文化、经济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比较农业文明和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差异,颂扬传统社会的优越性。评论家认为重农主义者理想化了南方的过去,南方作者史密斯(Lillian Smith)指出,“逃逸者立场最根本的弱点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人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来自奴隶制以及之后产生的租赁制、种族隔离和允许这些野蛮精神存在的价值体系。”<sup>[3]</sup>尽管重农主义不够完善,但它准确地预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尤其在社会情绪、传统价值沦丧方面的负作用。

然而,重农主义宣言发表之际,美国经济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南方的损失尤其惨重。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溃,紧接着的1930-31年的干旱使南方的农民生活更为艰苦。从1929年到1932年,棉花的产值从150亿降到450

万元;烟草作物的收入则下降了三分之二;花生的价格从每磅5分下降到1932年的每磅1.6分。南方约有850万租赁制的农民和佃户丢掉了工作。失业达到了警戒线,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两年,失业率成倍的增长,及至1933年,南方许多工会的报告证明,至少百分之三十的工人失业。1933年,根据社会工人组织的调查,亚特兰大市的失业率在市区是25-30%,在黑人住宅区是70-75%。南方最为工业化的城市,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1930年中期的煤产量只是1926年产量的三分之一,钢产量下降了一半(从150万吨到75万吨),工人每两个星期轮一次班,以至于人们嘲笑道,“阿拉巴马河现在是一星期中只有三天才流动一次”。<sup>[3](P.15-20)</sup>传统经济学中所信奉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观点受到极大冲击,出现了普遍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由于这场经济危机,新批评发起者所持有的农业理想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他们推崇的重农主义本来是颠覆北方资本市场的话语,但在同经济领域话语的交换之中,重农主义的农业经济理想受到颠覆,而新批评继承了重农主义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文化批评,并且由于其中所富含的文学社会意义起到了和经济政策共谋的作用,能间接压制1929年以来因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崩溃而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而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吸纳。另外,他们受到罗斯福新政的吸引,认为“尽管新政不能改变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但它的政策却能受到非纯经济因素,如社会、文化动机的影响”。<sup>[4](P.30)</sup>新政期冀建立一种社会稳定感、集体感、国家认同感,这和重农主义的社会理想一致。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摒弃了传统经济学的二分法,转而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和社会有效需求原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普遍失业的现实,并建议政府以经济体系的整体性为着眼点,对国家资源充分利用,以缓解社会压力。这种追求内部和谐的话语模式和新批评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新批评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话语在特定语境下成为互相呼应的社会活动。

## 二、凯恩斯话语模式和新批评话语模式

尽管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话语是两种社会领域的不同话语,但其话语模式都再现了“有机统一”的概念。新批评的重农主义先驱所宣传的世界观建立在虚拟的文化想象上,充其量是一项怀

旧思乡的计划;而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的过渡,则是一种从文化的想象阶段到象征阶段的观念的转移。新批评者对文学和文化的关注,是一种社会理想的折射。按照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是“处于守势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中重新虚构了现实中他们无法找到的一切。诗(文学)的统一有机消除了阻力、反常、矛盾,因此读者相应具有对世界同等意识形态的态度。”<sup>[5] [P.12]</sup> 新批评在文本中发现了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对于构筑文本中心的世界,新批评家们各自从不同侧面做出了完善。兰色姆在“征求本体论批评家”(1941)中,反对把道德、逻辑、情感等看做诗的本质;而在“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1941)中,兰色姆提出了“构架-肌质论”来说明本体论。兰色姆的这种结构观对应着他对于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兰色姆认为诗与历史之间是镜像的关系,诗中怀旧性展示的一切反映出失去的世界。对于兰色姆而言,诗歌的完美再现了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级和秩序。泰特(Allen Tate)也持相同的镜像观点,但他的注意力不在完美的结构,而在诗歌中的片段和断裂;他关注否定和含糊,强调文学内部的矛盾统一。在《论诗的张力》(1937)中,泰特提出著名的张力论:要求诗歌既注重内涵,又倚重外延,诗应当是“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sup>[6] [P.71]</sup> 现代诗人最基本的问题是传统的失落,而艺术作品中的张力,代表着活力和权威,文本中的矛盾再现了社会话语的冲突,而“通过统一,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就‘对应’(corresponded)于现实本身”。<sup>[5] [P.46]</sup> 泰特的张力论是社会矛盾的再现,反映了处于社会崩溃边缘的知识分子理想的消除社会矛盾的方式。

重农主义者发表了《我将采取我的立场》之后,于1936年又发表了《谁拥有美国?》(*Who Owns America*)。在这一卷论集中,他们的态度已经逐渐改变,不再坚持回到农业社会,而是讨论知识分子的位置和社会作用。兰瑟姆的文章“南方需要什么?”(*What Does the South Want*)没有像以往一样捍卫南方和土地的联系,而仅是讨论农业存活之道和大工业生产的差别;泰特的文章“自由和资产之注释”(*Notes on Liberty and Property*)批评企业资本主义是资产拥有者的观点。而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文章“文学作为一种症候”(*Literature as a Symptom*)则试图证明现代美国作家如何不再能自主地地下意识地

拥有一种社会的或道德的主题。重农主义在这段过渡时期,已经显现出日后突出的有机统一观,开始强调文学的自体地位。大萧条时代的来临,使大学成为人才的蓄水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尤其是1935年,美国大学发起了关于文学教育功能的辩论。大众教育的膨胀使得教学手段、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都成为关注的焦点。新批评提出的文学本身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成为一种社会的黏合剂,并在文学教育活动中建立了社会文化批评的阵地。

凯恩斯主义则在经济领域呼应着新批评的有机统一观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人们的心理规律怎样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并影响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无法达到均衡,从而实现充分就业。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陷入全面的毁灭,凯恩斯认为,必须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以使“有效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sup>[7] [P.28]</sup> 他的基本判断是“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因而)结论是: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sup>[8] [P.331]</sup> 所以,“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当然会大为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sup>[8] [P.393]</sup> 为此,凯恩斯希望通过改变消费倾向来扩大消费需求。

凯恩斯认为有三条心理规律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影响了有效需求。这三条规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意味着人们总要留一部分收入不全部用于消费;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意味着投资者并非全部投入所有资金,要增加投资,就要积极创造一种能够使投资者保持乐观情绪和信心的环境和气氛;三是流动偏好。人们在心理上更喜欢以现金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部分收入或财富。这是出于交易动机,为了应付业务或日常生活开支;或谨慎动机,出于防止生老病死等需要;或是投机动机,为了获得更大收益机会的需要。这三个假设决定了需求总是小于供给,即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会带来失业、经济不平衡和危机,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必然的趋势,政府就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帮助大众投资,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吸取滞留的现金,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教育作为国家投入的重点支出之一,拉动教

育需求,既安置了社会闲散人员,也将文化教育变为一种产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

从新批评和凯恩斯主义的话语模式来看,两者的述说者都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其政治定位是为社会上层建构服务,以减少社会摩擦,消除不安定情绪。两种话语的受述对象都集中在社会个体,新批评是通过文学修养或教育来将个人的经验整合集体的、国家的、或民族的“普遍真理”中;而凯恩斯主义是通过政府职能,“为所有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sup>[9] (P. 82)</sup>因而反映出来的共同主题都是有机的整体观。两种话语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既是特定社会语境和社会需要的结果,也是话语链交织所产生的特殊效应。

### 三、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的社会效应

作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社会极其重要的两者社会话语,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都起到了稳定人心和发展经济的社会效应。凯恩斯主义重视个人需求,鼓励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它从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统一和谐的结构观出发,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国家经济结构,这种结构观和新批评的结构观不谋而合。新批评认为,文学具有本体的独立的地位,而审美具有普适性和普遍性。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文学领域中统一的体系,可以按照语言的模式科学地描绘文化现象的图谱。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两种话语链的交织,生产出一种抽象意义上人的概念,既可以作为经济领域中静态的定量分析,也可以作为文化领域中审美的永恒的载体,而国家作为这种个人的集合体,需要受到保护和尊重。

新批评的结构观从表面上看,是对文学本体地位的推崇,但他们同样重视文本的交流和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他们认为,诗歌总是交流的形式——一种包含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而不能视为一种个人反应,因而文学研究是研究和这些个人反应的形成相关的语言过程。正是如此,新批评才提出了诸如“意图谬误”和“影响谬误”等术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打算使诗歌和生产或消费情境相脱离,而是要关注文学行为的特殊性,识别定义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文本过

程。”<sup>[4] (P. 77)</sup>他们陈述道,“诗歌的效果总是依靠关系。”可见,新批评的结构观是希冀在混乱和断裂的现代社会,重新建立诗歌和语境的联系,新批评不是拒绝历史或语境,而是拒绝文学只是历史的再现或语境的表达。新批评所坚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不仅反映,而且解读语境。

新批评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了系列经典著作。1936年,沃伦和珀斯尔(John T. Purser)发表了《文学指南》(*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1938年,沃伦又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发表了《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1943年,两人进而推出了《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这一系列新批评经典著作奠定了以文本细读方式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在美国大学中引起对文本内部和文学本体地位的重视。他们指导教师将注意力集中到文本和诗歌本身,而不是将文本作为作者自传,或历史精神的产物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新批评主张从内部分析,从方法上看他们似乎摒弃了历史和社会等外部材料,但实际上却提高了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文化活动的价值。正如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处境很艰难,他们依赖资产阶级领域的经济生产,被描绘成统治阶级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领域工作的这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和在经济生产领域的那一部分斗争,以提高同经济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的价值。”<sup>[4] (P. 18)</sup>因此,新批评所在的文化领域不仅要宣称文化活动的自主性(autonomy),以保证文化行为不受经济标准的评判,而且需要通过文学研究,培养公民们成熟的、有判断力的审美态度,并使审美和道德标准相连,从而达到自我规约的目的。

尽管新批评宣称文学独立于历史和社会,但它仍然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理论,这种美学的思想根基所反映出的精英意识,是和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和文化艺术都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作为经济领域的主导话语,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减税增加个人收入;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和扩大公共事业投资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因而可以从宏观角度出发,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sup>[10] (P. 60)</sup>大萧条之前,西方社会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价格机制就是一种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可以自动调节市场,国家根本不需要对经济进行干预。而1929年及其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暴露了单一价格机制调控经济的不足。显然,如果不能稳定经济基础,创造就业机会,资本主义社会就面临巨大冲击。从凯恩斯主义的有机统一的经济观来看,这种经济政策也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美国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制定了系列政策,经济得到明显好转,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到了一个新的空间,二战结束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些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也将这段时期成为“凯恩斯时代”。同样,50年代也是新批评的“黄金时代”。新批评的出现在30年代被视为“反学术传统的激进分子”。<sup>[11]</sup> P.343)在许多大学英语系,身为新批评分子则意味着反体制,反学术,甚至反文化的激进人士。甚至“贴有新批评标签的年轻人,都很难有资格在好学校里的英语系找到职位”。<sup>[11]</sup> P.345)然而,美国大学的扩招和大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使新批评“专业化”的批评方法得到广泛认同;另外,40、50年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现,新批评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避免左倾的话语范式,提供了一种道德价值,而受到广泛接受。新批评的拥护者进入了大学、中学课堂,牢牢占据了文化领域的主导话语位置。作为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两大主导话语,凯恩斯主义稳定了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的角度看,这种经济理论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复制,并通过生产资料的国家调配,平衡并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而新批评从教育的角度培养公众的审美情感。这种“美”或“美感”被推崇为超越历史的,可以独立存在的经验。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新批评所生产的“普世真理”展示了一种和睦的关系,一个情感共享的和谐王国,成为凯恩斯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再现,具有市场价值。两种话语链的交织起到了社会安抚作用。凯恩斯主义使流离失所的大众得以庇护在国家经济干预之中,而新批评使惶恐的社会大众在文学阅读中找到精神家园,并通过这种人文学习而认同民族的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两者都是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 结论

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作为美国30年代至50年代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两大主导话语,其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语境交换和协商的产物。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主张以政府作为中心建立一个有机的社会,以避免各政府部门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经济恶化。这种经济话语维护了中产阶级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为政治话语所挪用,成为美国新政主要的理论基础;而新批评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在文学领域也被再现为精英式的政治力量。他们这种文学话语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束缚,可以独立存在的审美经验,并通过学术机构的生产和推广,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富有教化功能的话语。凯恩斯主义和新批评两者都从有机统一的宏观角度出发,主张各经济部门的有效协调,或研究文本内的各种冲突对立的相互关系,其话语模式具有相似点,并都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的社会效应。

## 参考文献:

- [1] John Braeman. *The New Deal: the National Level* [M].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3] Roger Biles. *The South and the New Deal* [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 [4] Mark Jancovich.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New Criticis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英]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6] Richard H. King.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1955* [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7] 胡希宁.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 [8] [英]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M]. 高鸿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方福前.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0] 王雪梅、谢实. 西方经济学简史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Louis D. Rubin. *The Wary Fugitives: Four Poets and the South*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收稿日期: 2011-03-26 责任编辑 金正